

天主教传入湖北谷城沈垭历史略述

李小驹, 金峰

(襄樊学院中文系, 湖北襄樊 441053)

摘要:湖北省谷城县沈垭天主堂从清朝雍正年间便是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总堂。它曾在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沈垭天主堂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风雨的洗礼, 现根据有限的资料, 对沈垭天主堂近四百年的历史演变做一个简要的梳理, 以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沈垭; 天主教; 历史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4X(2006)03-0133-03

按照许多学者的说法, 16世纪基督教来华可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 与今日所谓现代化转型遥遥相接^[1]。由此观之, 1634年湖北省谷城县沈垭天主教会的建立, 实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是透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外交关系等诸方面不可或缺的一环。另一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党和国家各项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尤其随着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利用宗教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业的日渐关注, 使得对沈垭天主堂的深入研究已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但由于年代久远, 资料缺失, 国外虽藏有相关资料, 但一时难得, 与国外学者和国内研究力量亦缺乏衔接。2004年8月, 我们同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基地有关专家赴沈垭天主堂进行田野调查, 随后我院部分教师又进一步做了深入调查。为能唤起国内外学者对该项研究的关注, 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笔者现根据非常有限的文字资料及田野调查所得, 将谷城沈垭天主教发展的历史作一简要的梳理, 以抛砖引玉, 向方家请教。

沈垭位于湖北省谷城县城以西70公里的紫金山区, 西与房县接壤, 南与保康相邻, 靠近神农架原始森林。这里峰峦叠翠, 古木参天, 气候宜人, 物产丰饶。在天主教罗马教史中把沈垭称为木盘山或磨盘山, 也称茶园沟或查员沟。沈垭现是隶属紫山镇的自然行政村, 有人口约500人, 其中400多人是天主教徒。沈垭天主堂从清朝雍正年间便是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总堂, 一度还成为地位仅次于北京的“中华全国公教重教地区”。沈垭大经堂等主建筑群座落于十字山东麓的龙凤山及磨盘山和铜锣观三山环抱的茶园沟盆地西沿, 占地面积30余亩。自明末天主教传入沈垭以来, 历任神父不断营建, 先后建起了修道学院、育婴堂、男婴小会(俗称三学)、大圣堂等。到1950年, 沈垭总堂共辖有会口21个, 教众达4000余人。在近400年的历史风雨中, 沈垭天主堂几经沉浮, 有快速发展一帆风顺的时期, 也有艰难求生存务停滞的阶段。概括起来, 沈垭天主教历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1 耶稣会时期(1634—1784)

据义和团举事文记载:“湖北西北境, 奉教最先。明崇祯9年(1634年), 已有耶稣会教士, 传教其地”^[2]。第一位有

名姓的来鄂西北传教的神父, 据方济各杂志记载是耶稣会的何大化(外籍)。至清康熙年间, 襄阳知府江某(天主教徒)大力支持神父穆迪我(外籍)传教, 襄阳百姓受洗者达五六百人。早在1669年(康熙八年)清政府已经开始禁止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教堂和进行传教活动。直到清中叶, 清朝政府对天主教一般采取严格取缔的方针, 屡次发布禁止西洋人传教的命令, 并制定出传教治罪条例。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颁布天主教禁令, 襄阳等地不愿改教的部分信徒300多人结队来到木盘山隐居避难。当时这里尚是一片荒山, 教徒们起草屋而居, 开荒种粮, 并建起一座小圣心堂开展宗教活动。不久, 北京耶稣会会长巴多明(法籍)得悉这里的情况, 便派人携巨银前来慰问, 并在木盘山圣心堂附近购地建房, 以供信徒避难和教士传教。1731年, 耶稣会神父胥孟德(法籍), 从广东来到木盘山, 第一次在圣心堂举行弥撒仪式。他看到此地较其他地方安稳, 于是在离去不久便派外籍神父纳味埃勒和阿米德来此主持教务。当时木盘山教堂被称为“中华全国公教重教地区之一”, 地位仅次于北京^[3]。1774年, 耶稣会教士在欧洲遭到排斥, 已无法继续来华传教, 湖广全境仅存华籍神父郭类思一人支撑教务, 死后就葬在木盘山。耶稣会又勉强维持了10年, 最后将教务交给了遣使味增爵会(简称遣使会或味增爵会)。

2 遣使味增爵会时期(1784—1838)

1784年7月12日, 遣使会奉罗马教廷之命接管耶稣会在华教务, 法籍神父罗鹿阁为中国遣使会会长。1790年, 遣使会派外籍神父阿本、潘奈二人来谷城茶园沟传教。本地教务瘫痪已久, 经二人大力整顿方得恢复。潘奈劳累成疾, 吐血而亡, 年仅29岁。当时湖广教务由山西主教管辖, 后教皇批准增设湖广主教, 由阿本担任。阿本在去北京谒见遣使会长的途中, 于西安被捕, 病死狱中。

1793年法籍神父刘克来从江西调到湖广主持教务, 长住沈垭达27年。后调来助理神父7人, 除法籍神父杜玛塞外, 其余6人均均为华籍神父。刘克来主教在给北京会长的信中说:“本属有羊七千, 散于本省之十七县……”^[4]。可见当时沈垭天主堂神父管辖的范围之大, 地位之重, 已成全国仅有的几个天主教中心之一。在刘克来主持沈垭教务

期间,天主教在本地发展很快,已拥有会口十几个,信徒二千多人,在当地影响很大。

1812年(嘉庆十七年),谷城知县周以卓和试用知州郑伟等奉谕查禁天主教,率兵三、四百人来沈垭捉拿刘克来和杜玛塞二位西方教士,未获。于是焚毁教堂,抓走部分忠实信徒,并对刘、杜二人悬赏缉拿。1819年6月初,谷城官兵又来,刘克来先藏于沈垭老虎洞,后逃到河南南阳一教友家躲避,被人出卖,于6月16日被捕获,移解武昌,于次年2月18日在武昌城外沙湖被处绞刑。葬于洪山宝通寺附近。1900年4月27日,教皇册封其为圣徒。刘克来死后,沈垭一带的教堂和会口被查禁,有20年左右该地教务陷于困顿。

1836年(道光十六年)6月,法籍教士董文学在刘克来去世16年之后来到沈垭主持教务。在他的耐心劝导下,沈垭一带的信众又逐渐恢复到2000多人,会口15个。董文学讲经生动,每逢瞻礼,听者踊跃。他为教友息解纷争,排忧解难,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威望。1839年9月12日这一天是圣母升天瞻礼,在沈垭教堂望弥撒的信众有1500多人。谷城县令胡庆奉湖广总督周天爵之命率衙役及石花巡检,把总一共三、四百人,突然来沈垭捉拿董文学。众人四散,董文学先躲至竹林,后又逃到荒草扒,终因教徒出卖而被捕,并移解武昌,于1840年1月15日因违反禁令潜入内地传教被执行绞刑,死后葬于武昌洪山刘克来墓旁。1889年5月13日被教皇册封为圣徒。沈垭天主堂后在董文学被捕处立有十字架。1890年由神父南熙倡议,教友捐资在沈垭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作为对董神父的永久纪念。

3 方济各会时期(1838-1949)

1838年味增爵会结束了湖北的教务,从此沈垭天主堂改由方济各会管辖。同年设湖广主教区,由意籍神父李若瑟为主教。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解除了天主教禁令,允许天主教在华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进行传教,并承诺保护教堂和传教士,天主教开始在华公开活动。

1856年教皇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个主教区,湖北主教是意籍神父徐类思伯达,他还同时兼任全华教务巡回使。1862年徐去世后其职位由意籍神父明希贤接任。

1870年经教皇批准又将湖北教区划分为东区、西北区、西南区三个主教区。其中鄂西北教区属于自治教区,辖襄郧两府各县会口。全教区下分6个区:谷城和保康为一区;光化和均县为一区;郧西、郧县、房县、竹山和竹溪为一区;襄阳县为一区;枣阳为一区;南漳县和宜城县为一区。第一任代理主教是意籍神父杨化周,其病逝后职位由明希贤代理,住沈垭老总堂。

1872年意籍神父毕礼升为主教。当时教堂毁损,教徒大减,毕礼积极恢复。法国和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出资10万法郎,在沈垭购买土地,大兴土木,修复教堂,开设修道学院和育婴堂,增设传教会口,联络官绅,沟通教民关系,使教务有了显著进展。现沈垭十字山原名玉皇顶,海拔约1100公尺,原为道教道场,香火曾经很旺,据说当时香客之多几可与武当比肩,人称“小武当”,后逐渐衰败。1873年毕礼将玉皇顶从山场业主手中买下,并在山顶矗立起巨

大的十字架。1875年2月28日毕礼呈请罗马教皇批准,凡到玉皇顶朝拜十字架者可得全限大赦,“既赐准凡信友告领往朝玉皇顶之圣十字架者,依例祈祷为圣教广扬,能得全赦。每年一次”^①。此后每年十字架瞻礼日(9月14日),不仅本教区,而且河南、随县等很多外地教民都来朝拜十字架,于是山名就改为了“十字山”。

1874年5月12日毕礼病逝于沈垭教堂,教职由意籍神父范怀德代理。1879年9月19日意籍神父南熙继任鄂西北主教,范调任湖南主教。

南熙在沈垭任职达23年。他继续在沈垭修建教区主教座堂,并于1884年秋天竣工。这是一座高大宏伟的西式教堂,宽20公尺,深50公尺,高16公尺,内设能容纳千余人的瞻礼跪凳。堂内存有南熙从意大利带来的高5公尺,宽3.5公尺的方济各像;有范怀德从法国巴黎运来的体大音宏的大管风琴;还有圣母保佑像和金圣爵等稀世珍品,号称“四宝”,沈垭天主堂可谓极一时之盛。南熙为本地的教务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1903年病故后葬于沈垭墓堂。其职位由比利时籍神父杨睦多代理至1904年调任宜昌主教为止。继任主教为意籍神父毕世修。

晚清及民国时期,乃是在华天主教会的多事之秋。鄂西北一带多次爆发反天主教的活动。1889年12月南熙在出巡枣阳时被群众围困;同期沈垭育婴堂被控对婴儿刺眼剖心,官府前来勘验;1892年夏秋之时,谷城、光化、襄阳病疫流行,风传是洋人在水中下毒所致,社会上兴起排教风潮;1895年农民陈之端率民众推倒玉皇顶十字架;1900年谷城西山义和拳首领陈立国、陈立义两次率众攻打沈垭教堂;1931年5月5日,贺龙部队上房县时路经此地,杀死教堂神职人员7人,其中外籍教士5人,华籍教士2人。

1928年沈垭天主堂成立方济各会。1930年成立沈垭天主堂方济各会院,由意籍神父董文林任院长,1933年改由意籍神父艾国良任院长。至1949年,男女会员发展到90多人。

4 “三自革新”爱国会时期(1950-1981)

1949年冬,紫金山区全部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1950年秋,当地人民政府成立了“天主教沈垭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爱国委员会”来管理本地教务。主任由国家干部李国成兼任,华籍神父常和德任副主任。意籍神父艾国良和华籍神父李崇厚被人民政府羁押,其他西方教士被遣返回国。教会资产中除将大经堂和小堂留给教会外,其他房舍和田地一律收归国有。

沈垭天主教的活动在此期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自1950年土改至1958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教务活动基本正常,只是信众大为减少;自1959年至1966年为第二阶段,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四清”、“社教”等影响,教务活动基本停滞;自1966年秋至1981年为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给沈垭天主堂带来巨大的破坏,大经堂、钟楼、小堂、墓堂、董圣堂等教会主要建筑或被夷为平地,或拆毁后地基改作他用。

5 爱国会时期(1982年至今)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开始逐步得到落实。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1982年《中共湖北省委(56号)文件》批准沈垭天主堂为湖北省重点开放教堂,并重新组建了“天主教沈垭爱国委员会”,台属陈家本任主任,聂一峰神父任副主任。当地政府根据政策将方济各会院及原围墙内的部分土地和树木归还给教会。经过爱国会和部分教徒的积极筹备,1985年5月21日沈垭天主堂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开堂典礼,省、市、县、区各级政府领导莅临祝贺观礼,参加典礼的教众近3000人。十字山上的大十字架也重新矗起。从此,沈垭天主堂开始了正常的教务活动,来参加活动的信众不断增多,每逢主日来天主堂望弥撒的一般在500人左右,若逢圣诞节、复活节等大瞻礼日,望弥撒的往往达一、二千人。

1988年国务院宗教局拨款数万元,加上爱国会自筹

资金共计10余万元,对教堂破损的房屋进行了修缮改造,使教堂内外环境为之一新。2004年8月襄樊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研究所联合在襄樊举办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宗教诠释”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知名学者考察了沈垭天主堂,准备为天主堂的建设和发展联系引进资金。襄樊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宗教专业委员会、市宗教局、谷城县委县政府都对沈垭天主堂的发展非常关注,正采取措施加大对沈垭天主堂的研究和支持力度。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沈垭天主堂将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中国宗教正在步入历史的黄金时期的一个有力佐证。

注释:

① 成和德. 湖北襄郧属教史记略.

参考文献:

[1] 刘小枫. 圣类降临的叙事[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A Brief History of Catholicism in Shenyang, Gucheng City, Hubei Province

LI Xiao-ju, Jin Feng

(Chinese Department, Xiangfan University, Xiangfan Hubei 441053, China)

Abstract: The Shenyang Catholic Church in Gucheng City, Hubei Province has been the main Catholic church in the Northwest Hubei ever since the Yongzhe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atholicism's introduction to China. Shenyang Catholic Church has weathered a long history. Based on the limited backgroun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offer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henyang Catholic Church's almost four hundred year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henyang; Catholicism; history

(责任编辑:漆福刚)

天主教传入湖北谷城沈垭历史略述

作者: [李小驹](#), [金峰](#), [LI Xiao-ju](#), [Jin Feng](#)
作者单位: [襄樊学院, 中文系, 湖北, 襄樊, 441053](#)
刊名: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XIANGF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年, 卷(期): 2006, 5(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条)

1. [刘小枫](#) [圣类降临的叙事](#) 2003

相似文献(2条)

1. 期刊论文 [管文娟](#), [Guan Wenjuan](#) [一座教堂一部历史--湖北谷城沈垭天主教堂历史初探](#)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14(3)

湖北谷城沈垭天主教堂自清朝以来一直是天主教在鄂西北的活动中心,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在罗马教廷档案中也曾有所记载.笔者采用田野考察的方法,对沈垭天主教堂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以找到中国近代天主教的发展特点在这一地区的具体呈现.

2. 学位论文 [黎霞](#) [从“谷城教案”看晚清鄂北乡村社会矛盾](#) 2004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的重大事件,它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以发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谷城教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教案的剖析来考察晚清乡村社会的矛盾及其消长.谷城教案的发生起源于1892年夏天鄂北地区瘟疫的爆发.有传言称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出钱贿人往井水里投毒.谣言迅速传播,于是数千村民组成民团将谷城沈垭天主堂团团围住,并称要杀死教士,抢夺教产.襄阳府的官员们率领军队及时赶到,制止了一场严重涉外事件的发生.晚清的鄂北社会正处于向近代转型的起步阶段,身处其中的农民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贫困,原有的社会信念及思想信仰日渐动摇,心理上极度焦虑而无以解脱,徘徊在心理承受的底线上.他们一方面需要宣泄心里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寻求安全感和解脱,1892年的瘟疫就像一个导火索,而天主教恰是个合适的宣泄对象.从谷城教案的发生与解决中,我们可以看出晚清鄂北乡村社会的矛盾及其消长.原本在乡村社会有官、绅、民、秘密社会四个阶层,而洋人及天主教会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并因其特殊的背景与身份,而使其自身成为原有社会各阶层合力反抗的对象.清政府没能处理好各种矛盾,新、旧矛盾一并激化,使晚清中国的转型处于十分不利的条件之中,并最终导致了近代化进程的曲折反复、发展缓慢,足为今日之鉴.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fzyjsxyxb20060405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91b36623-30f1-4f5d-98c9-9e4d0081d2c7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